

朱家驊、傅斯年與北京大學的復員 (1944-1946)

袁經緯

摘 要

北京大學與其前身—1898年成立的京師大學堂，歷經清廷、中華民國、中華人民共和國三個政權，至今仍是中國高等教育的代表學校之一。抗日戰爭期間內遷的北大、清華和南開在重慶聯合組成國立西南聯合大學，是大後方最重要的高等學府。這場戰爭改變中國高等教育的格局，而戰後復員政策又使教育資源重新分配。本文嘗試以朱家驊、傅斯年等不同背景的人際關係網絡，勾勒戰後北大復員過程的曲折。其中朱家驊以學人從政身分援助北大，提供了研究的新視角；他與代理校長傅斯年的合作，為北大復員打下良好的基礎。

國民政府規劃高等教育配合國家建設，恰合北大學人長期以來欲打造該校成為世界一流大學，不論是1931年及1944年兩次擔任教育部長的朱家驊、戰後代理北大校長的傅斯年，還是1946年回國接掌校長的胡適，都為完成這一理想而努力。戰後復員期間，朱家驊在能力範圍內，給予北大人、行政和經費諸多協助，加上傅斯年運籌帷幄，實現了擴增醫、農、工三個學院的計畫。相較於戰前僅有文、理、法學院，此時的北大粗具一流大學規模。雖然工學院與國家邁向現代化工業步伐息息相關，但傅斯年等人有其他考量，僅投入有限資源。除此之外，北大復員過程中隱含與清華的較勁，因朱家驊位居行政中樞，以及清華教授時有反對政府的言行，使得北大在此時期占有優勢。

關鍵詞：朱家驊、學人從政、北京大學、傅斯年、清華大學

Jia-hua Zhu, Si-nian Fu, and Restoration of Peking University, 1944-1946

Jing-wei Yuan^{*}

Abstract

Peking University has experienced three successive Chinese regimes since its founding in 1898, and has remained one of the most distinguished schools of higher education in China. During the Second Sino-Japanese War, Peking University, Tsinghua University and Nankai University retreated inland and jointly formed the National Southwest United University, which was the most important university in Nationalist government ruled area. The war changed the pattern of higher education in China. After the war, the policy of Nationalist government led to a reallocation of educational resources. This article outlines the complex process of the return and reopening of Peking University after the war, focusing on the cooperation between Jia-hua Zhu and Si-nian Fu, especially the assistance given by Zhu's status as a scholar politicians.

The government's plan for higher education was in accordance with its effort of national construction. The administration and faculty at Peking University seized this opportunity to build the school into a world-class university. Zhu, a former member of faculty at Peking University, now served as Minister of Education and offered key assistance in funding and personnel to Fu, the university's acting president. By the time Peking University completed its re-establishment, it had expanded from three to six colleges and was indeed becoming a world-class university. However, due to certain considerations by Fu and others, the newly established engineering college had only limited resources. In view of

^{*} Ph. D. Candidate, Department of History,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China's need for modernization, of which industrial development was an important foundation, this was an unfortunate weakness. During this time Peking University and Tsinghua University were competing for educational resources, but because Zhu controlled governmental power, and also because professors at Tsinghua often engaged in anti-government speech or activity, Peking University enjoyed an obvious advantage.

Keywords: Jia-hua Zhu, Scholar Politicians, Peking University, Si-nian Fu, Tsinghua University

朱家驊、傅斯年與北京大學的復員 (1944-1946)*

袁經緯**

壹、前言

黨國體制如何整合知識階層，成為國家建設的力量，在民國政治史領域中長期受到關注，「學人從政」是其中重要的課題。過去有關學人從政的研究，大致分為兩種研究取向：（1）從人際網絡和政府部門的視角，探討學人如何參與國家建設及其影響。1931年蔣介石（1887-1975）第二次下野後，試圖跳開黨政派系網絡，開始聯繫學術界，部分學人成為爭取目標，以諮詢國政或改善政府形象。¹ 例如1932年11月成立國防設計委員會，1935年4月改組為資源委員會，著手資源調查並推動工業建設。² 軍事委員會侍從室作為幕僚單位，在軍事、政治、經濟等領域提供建議，成為戰時決策的重要參考。³ 學人在上述資委會和侍

* 本文寫作期間，承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兼任教授劉維開與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退休副研究員劉素芬惠賜修改建議，又承蒙兩位審查人及編輯委員會提供寶貴意見，特此致謝。

收稿日期：2022年5月27日；通過刊登日期：2022年7月18日。

** 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博士候選人

¹ 參見金以林，〈蔣介石的1932年〉，收入汪朝光主編，《蔣介石的人際網絡》（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1年），頁137-163；鄭會欣，〈蔣介石與民國學人關係的嬗變（1932-1949）〉，《二十一世紀》，總第177期（2020年2月），頁44-64。

² 鄭友揆等著，《舊中國的資源委員會（1932-1949）——史實與評價》（上海：上海社會科學出版社，1991年）。

³ 張瑞德，《無聲的要角：蔣介石的侍從室與戰時中國》（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2017

從室扮演的角色受到重視。(2) 針對學人參與政治的個案研究，在掌握一生經歷和時代脈絡的基礎上，分析個案的思想變化與實際作為的關聯。⁴ 尤其是學人在政治事功與學術研究之間的掙扎，能夠引起研究者共鳴。

1935年蔣介石出任行政院長進行內閣改組，1938年因應對日抗戰調整行政組織，戰爭期間內閣人事變動頻繁，當中不乏重要學府如北京大學（以下簡稱北大）和清華大學（以下簡稱清華）背景的學人出任要職。他們除了必須融入黨政體制下的派系運作，也盡力爭取資源，為各自學校提供不同形式的援助，此一面向過去較少受到關注。1944年重掌教育部的朱家驊（1893-1963），自1917年回國後進入北大教授德文，即與北大結下不解之緣。北大執教期間是朱家驊學術界人脈網絡重要的養成階段。⁵ 從戰時北大的復員構想，到實際面臨的困難，朱家驊皆參與其中，從旁給予協助。⁶ 與此同時，北大在抗戰勝利前夕的易長風波，最終由胡適（1891-1962）繼任校長，未返國前由中央研究院（以下簡稱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以下簡稱史語所）所長傅斯年（1896-1950）代理職務。傅斯年運用以朱家驊為核心的人際網絡，配合傑出的行政能力，為復員打下堅實基礎。

本文以北大復員為個案，一方面提供研究學人從政的不同視角，另一方面探討復員政策與國家的建設方向，如何影響學校的規畫。就復員政策而言，包括收復區人事安排和教育甄審，對北大的影響有待釐清；而朱家驊因戰後的建設需要，提出新設醫學院、農學院與工學院的願景，符合北大學人打造世界一流大學的理想，卻因教育資源有限，勢將有所取捨。特別在復員過程中出現與清華的競爭，可以藉此反思既有研究強調自國立西南聯合大學（以下簡稱聯大）時期兩校

年）。

⁴ 涉及學人從政的個案研究歷久不衰，最新研究成果參見黃克武，《顧孟餘的清高：中國近代史的另一種可能》（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20年）；江勇振，《蔣廷黻：從大學學家到聯合國席次保衛戰的外交官》（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21年）。

⁵ 黃麗安，《朱家驊學術理想及其實踐》（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8年），頁85。

⁶ 北大畢業的陶希聖（1899-1988）回憶戰後教育部籌劃各大學復員，提到朱家驊特別重視北大，但沒有說明具體內容。參見大陸雜誌社編委會編，《朱家驊先生紀念冊》（臺北：文海出版社，1986年），頁262。

的合作精神。⁷

目前學界有關北大復員的研究，校史著作有概略介紹，主要利用聯大相關會議記錄，重點放在日本無條件投降之後的規畫和院系配置，以及大後方的復員經過。⁸事實上，戰爭期間中央設計局統籌規劃戰後各部會復員計畫，經教育部修訂，已有大致輪廓；⁹再透過當事人的日記可知，戰爭後期北大學人已針對復員規劃進行交流。¹⁰以上說明研究北大復員，不能僅著眼於戰後的情況，應追溯到更早的抗戰後期。在此應進一步指出，探討國家建設與高等學校發展的連結，據筆者所見，最早由華裔留美學界任以都以北大為例提出，後續葉文心結合文化史的視角，引領日後臺灣與中國學界的相關研究。¹¹晚近學者進一步分析政界與學界交錯的人際網絡，如何影響學校的發展。¹²蔣寶麟認為從各個方面來看，北大無疑是研究焦點，進而形塑所謂的「北大神話」；¹³然而以《北京大學校史（1898-1949）》為例，涉及戰後時期仍多著眼於學生運動。¹⁴至於針對朱家驊

⁷ 強調聯大合作精神的研究，可以易社強（John Israel）為代表。參見易社強著，饒佳榮譯，《戰爭與革命中的西南聯大》（臺北：傳記文學出版社，2010年）。近年來已有學者探討北大與清華在聯大期間的競爭面向，參見嚴海建，〈抗戰時期西南聯大內部校際分合的界限與爭論〉，《高等教育研究》，第41卷第3期（2020年3月），頁100-109。

⁸ 蕭超然編著，《北京大學校史（1898-1949）》（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88年增訂本），頁405-418；西南聯合大學北京校友會編，《國立西南聯合大學校史》（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年修訂版），頁68-75。

⁹ 賀金林，《抗戰勝利後國民政府教育復員研究》（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0年），頁27-29。

¹⁰ 鄭天挺著，俞國林點校，《鄭天挺西南聯大日記》，下冊（北京：中華書局，2018年），1943年3月14日，頁673。

¹¹ John Fairbank and Albert Feuerwerker eds.,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Volume 13: Republican China, 1912-1949, Part 2*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6), p. 372. Wen-Hsin Yeh, *The Alienated Academy: Culture and Politics in Republican China, 1919-1937*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1990).

¹² 舉其要者如王東杰，《國家與學術的地方互動：四川大學國立化進程（1925-1939）》（北京：三聯書店，2005年）；Xiao-ping Cong（叢小平），*Teachers' Schools and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Chinese Nation-State, 1897-1937* (Vancouver: UBC Press, 2007)；許小青，《政局與學府：從東南大學到中央大學（1919-1937）》（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9年）；蔣寶麟，《民國時期中央大學的學術與政治：1927-1949》（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16年）。

¹³ 蔣寶麟，《民國時期中央大學的學術與政治：1927-1949》，頁420-422。

¹⁴ 蕭超然編著，《北京大學校史（1898-1949）》，頁405-480。

的研究，首推黃麗安《朱家驊學術理想及其實踐》一書。該書聚焦朱家驊推動學術發展的事功，例如主持廣州中山大學、中研院及其遷臺後的重建。書中指出戰後朱家驊積極推動中研院復員並拓展院務，但未提及朱家驊協助北大復員的經過。¹⁵ 黃麗安注意到朱家驊擔任黨政要職以及中英庚款基金會董事長的重要性，可惜未能進一步開展。如同何方昱的評論指出，朱家驊掌握政治資源，得以落實對學術發展的擘畫。¹⁶

綜合既有研究不足之處有三點：（一）重視大後方昆明的復員進展，忽略收復區北平的情況；（二）受限於資料和歷史書寫立場的差異，未深入探討復員過程中北大學人和黨政高層的互動，特別是朱家驊的角色；（三）北大的復員規劃未與國民政府的政策連結。本文針對上述各點，利用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朱家驊》檔案、國史館《蔣中正總統文物》、北京大學檔案，以及相關人物的日記和書信進行探討，以期深化對民國時期政學關係的論述。

另，本文囿於篇幅，未能進一步檢討北大復員決策，是否限縮日後培育科技人才的機會，從而削弱北大學人在政治界的影響力。特別是1949年中共建國後實行院系調整、師生思想改造，此後的北大與戰後復員時期相較，政學網絡有何變化，以及新政權下北大與清華的競爭，均值得另文深究，不在本文討論之列。

貳、抗戰後期影響北大的人事變動

戰爭期間北大學人因應戰局變化，對復員已有不同想法也有所交流。例如校長蔣夢麟（1886-1964）認為戰後北平不應該再有四所大學，應將校址移至城外的清華舊址。假設戰事一時不能結束，聯大應由胡適擔任校長。¹⁷ 此時胡適擔任

¹⁵ 黃麗安，《朱家驊學術理想及其實踐》，頁430。

¹⁶ 何方昱，〈民國時期從政學人的學術與事功——兼評《朱家驊學術理想及其實踐》〉，《史林》，2018年第5期（2018年10月），頁204-212。

¹⁷ 鄭天挺著，俞國林點校，《鄭天挺西南聯大日記》，上冊（北京：中華書局，2018年），1939年6月3日，頁156-157。戰前北平城內的四所大學分別為北京大學、清華大學、燕京大學和輔仁大學。

駐美大使，藉由其與親朋好友的往來函電，得以了解戰時北大的發展。例如胡適的妻舅數學系系主任江澤涵（1902-1994），向其說明聯合辦校能刺激北大進步。他比較北大和清華的師資，認為北大的文學院較為出色，但是理學院難與清華競爭，藉由聯合辦校能夠互補人才。¹⁸ 1942年9月，胡適卸任駐美大使不久，蔣夢麟致信說明聯大苦撐待變的情形，提到戰後北大的辦學方向，請胡適代為接洽美國各大學能否提供北大學生獎學金。文學院教授湯用彤（1893-1964）亦致信胡適，告知北大因經費吃緊影響學術發展，希望胡適多加援助，並早日回國掌理文學院。¹⁹ 戰爭改變戰前中國高等教育的格局，湯用彤認為外界頗嫉妒北大，勝利之後政府未必令北大復員。聯大總務長鄭天挺（1899-1981）認為湯用彤的看法過慮，但是必須注意日軍在華北的動向，可能阻礙復員時程。²⁰

北大同仁除了私下交流，1944年9月，開始以茶話會形式談論復員規劃。9月8日，蔣夢麟招待北大全體教授，說明復員三大方向為政策、人才和事前準備，其中又以政策和人才問題為要。政策方面應保持北大提倡自由和重視科學民主的傳統；人才方面則以兼容並蓄的精神網羅新人才。中文系教授楊振聲（1890-1956）和物理系教授饒毓泰（1891-1968）呼應蔣夢麟，認為對引進新人才要多加留意，應與胡適商議。²¹ 藉由上述討論可知，北大同仁認為胡適是支撐戰後北大發展的關鍵，其在學術界和政治界的影響力，能夠獲得實質援助。茶話會結束以後，籌備復員一事暫時停頓，可能與豫湘桂會戰爆發有關。²² 茶話會召開前後，正值廣西會戰期間，輿論普遍對戰事瀰漫悲觀的看法。隨著國軍由守反攻，1945年初聯大同仁對戰事估計轉趨樂觀。外文系教授陳福田（1897-1956）認為美軍將於6月以前在中國登陸，聯大即可遷回長沙；化學系教授曾昭掄（1899-

¹⁸ 耿雲志主編，《胡適遺稿及秘藏書信》，第25冊（合肥：黃山書社，1994年），頁168-170、174-175。

¹⁹ 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中華民國史研究室編，《胡適來往書信選》，中冊（香港：中華書局，1983年），頁550-554。

²⁰ 鄭天挺著，俞國林點校，《鄭天挺西南聯大日記》，下冊，1943年3月14日，頁673。

²¹ 鄭天挺著，俞國林點校，《鄭天挺西南聯大日記》，下冊，1944年9月1日、9月8日，頁922、926。

²² 豫湘桂會戰相當程度顛覆國民政府的統治根基，進而影響戰後國共內戰的結果。參見陳永發，〈關鍵的一年——蔣中正與豫湘桂大潰敗〉，收入劉翠溶主編，《中國歷史的再思考》（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15年），頁347-431。

1967) 則認為德國將在三個月之內覆滅，美軍不久可收復菲律賓，考慮後續登陸地點。²³

除了戰局變化的影響，1944年11月，內閣改組由朱家驊接任教育部長，直接影響教育資源的分配。戰爭爆發以來，國民政府內閣成員不斷更替，一方面牽涉黨內派系運作；另一方面必須顧及國內外輿論觀感，其中爭議最大的是行政院副院長孔祥熙（1880-1967）。此時傅斯年兼任國民參政會參議員，曾數次上書蔣介石，指陳孔祥熙不適任。²⁴ 其次，不滿的對象還有教育部長陳立夫（1900-2001），因其挾持教育資源，擴大黨內CC系在教育界的影響力，並且強力推動黨化教育。這些針對內閣成員個人行為或政策的批判，透過國民參政會定期開會，給予教育界一個抒發管道。例如同為參政員的顧頤剛（1893-1980）和周炳琳（1892-1963）曾質詢陳立夫，卻被陳立夫認為是朱家驊和北大學人密謀推翻其教育部長職務。²⁵

事實上，更換教育部長的傳言已久，蔣介石不斷思考各部會的適當人選。²⁶ 1944年5月25日，蔣介石徵詢朱家驊卸下中央組織部長，改任教育部長，未得朱家驊允諾。王世杰（1891-1981）是另一位考慮人選，蔣介石請陳布雷（1890-1948）詢問其意願。王世杰因身兼軍事委員會參事室主任及國民參政會主席團主席，不願放下手邊工作，轉而推薦朱家驊、羅家倫（1897-1969）、王雲五（1888-1979）三人。²⁷ 儘管朱家驊和王世杰都拒絕就任教育部長，蔣介石仍不斷試探兩人的意向。11月15日，王世杰仍堅持不就，請託陳布雷轉達；隔天陳布

²³ 鄭天挺著，俞國林點校，《鄭天挺西南聯大日記》，下冊，1945年1月25日，頁987-988。

²⁴ 王汎森、潘光哲、吳政上主編，《傅斯年遺札》，第2卷（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2011年），頁903-909、1055-1059。

²⁵ 鄭天挺著，俞國林點校，《鄭天挺西南聯大日記》，上冊，1942年11月12日，頁627。

²⁶ 鄭天挺著，俞國林點校，《鄭天挺西南聯大日記》，下冊，1943年11月18日，頁758；《蔣介石日記》，1944年5月20日，本星期預定工作課目、11月11日，本星期預定工作課目、11月14日，美國史丹佛大學胡佛研究所檔案館（Hoover Institution, Stanford University）藏。

²⁷ 王世杰著，林美莉編輯校訂，《王世杰日記》，上冊（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12年），1944年5月25日，頁607；陳布雷著，陳新林、呂芳上總編輯，《陳布雷從政日記（1944）》（香港：開源書局；臺北：民國歷史文化學社，2019年），1944年5月25日，頁88-89。

雷面謁蔣介石，蔣介石已擬好新的人事名單。²⁸ 11月17日，陳布雷告知王世杰，蔣介石希望他在教育和宣傳兩部之間擇一任事，教育部長職務將先詢問朱家驊的意願。隨後陳布雷前往中研院，朱家驊同意出任教育部長。²⁹

教育界對此次內閣改組的看法不無保留。鄭天挺認為改組後雖有新氣象，但孔祥熙仍擔任副院長、陳立夫轉任組織部長，並由CC系張厲生（1901-1971）擔任內政部長，是為國大代表選舉鋪路，能否得到外界同情，頗成疑問。³⁰ 當時傳言參政員杭立武（1903-1991）和周炳琳皆有可能擔任教育部常務次長，且將由聯大教育學系教授兼該校三民主義青年團分團幹事長陳雪屏（1901-1999）主掌高等教育司。³¹ 12月5日，鄭天挺與陳雪屏、史學系教授兼聯大區黨部書記姚從吾（1894-1970）談話，得知朱家驊決定以杭立武為次長；若陳雪屏不願就高等教育司，可能改由師範學院教授田培林（1893-1975）擔任。鄭天挺認為此次人事安排僅田培林與大學有關，尚且不如陳立夫在任時期。³² 實際上教育部的人事異動隱藏著派系因素，原高等教育司司長吳俊升（1901-2000）被視為陳立夫的人馬；田培林具有留德背景，曾在朱家驊國民黨組織部部長任內擔任訓練處處長。最終或出自派系平衡考量，高等教育司司長由派系色彩較不明顯的趙太侔（1889-1968）出任。³³

朱家驊接掌教育部，北大學人期待他能爭取更多資源。然而朱家驊擔任組織部部長以來，便逐漸培植自身勢力，此時面對國民黨內部的派系競爭，特別是抗戰期間CC系長期掌握教育系統，除了適度調整組織和人事，還需因應各級學校內國共兩黨爭取學生日趨激烈。1944年12月召開的教育會議，反映教育政策執

²⁸ 王世杰著，林美莉編輯校訂，《王世杰日記》，上冊，1944年11月15日、11月16日，頁652-653；陳布雷著，陳新林、呂芳上總編輯，《陳布雷從政日記（1944）》，1944年11月16日，頁200。

²⁹ 王世杰著，林美莉編輯校訂，《王世杰日記》，上冊，1944年11月17日，頁653；陳布雷著，陳新林、呂芳上總編輯，《陳布雷從政日記（1944）》，1944年11月17日，頁201。

³⁰ 鄭天挺著，俞國林點校，《鄭天挺西南聯大日記》，下冊，1944年11月21日，頁958。

³¹ 鄭天挺著，俞國林點校，《鄭天挺西南聯大日記》，下冊，1944年11月29日，頁961-962。

³² 鄭天挺著，俞國林點校，《鄭天挺西南聯大日記》，下冊，1944年12月5日，頁965。

³³ 徐友春主編，《民國人物大辭典》（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1991年），頁157-158；張朋園、沈懷玉合編，《國民政府職官年表（1925-1949）》（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7年），頁192。田培林日後於1946年11月出任教育部常務次長。

行上的兩難。中共參政員張國燾（1897-1979）認為陳立夫推動黨化教育，失去教育界支持，教育政策應有所調整，但是並不代表放棄在校園內發展黨的組織。他希望朱家驊改弦更張，挽回流失的人心。³⁴ 另一位與會者中央監察委員袁晴暉（1900-？），認為問題在於教育如何配合政治，必須利用政治鬥爭的手段對付學潮；親近朱家驊的甘家馨（1904-1977）更明白指出「現在辦教育，事實上是政治問題，我們必須有陣容、有佈置、有步驟的來接防，不宜侈談自由，而授人以柄。」³⁵ 綜合而言，教育界對朱家驊上任有所期待，多數黨政人士則希望維繫對教育界的控制，朱家驊只能謹慎處理各方要求，保存自己的政治資本。

上述與會者提出重點發展的策略，北大成為首要目標。此時北大學人在政治界和教育界占據重要位置，彼此之間互有聯繫。例如朱家驊誇讚胡適高瞻遠矚並長期關懷教育，希望今後多方指教。³⁶ 朱家驊自1940年9月代理中研院院長，便與傅斯年長期合作，兩人有深厚交情。³⁷ 傅斯年長期關注北大，在朱家驊上任不久，便去函說明自己對北大發展的構想。他抱怨聯大成立後北大一無所得，此時應有人挺身而出，肩負起復員重責。傅斯年的建議包括文、理、法學院指定人選接洽師資，安頓新聘教員於適合機關；北大欲增設工學院，應當以聯大未設立的科系為主，如水利系和建築系。除此之外，還有重要的經費問題。³⁸ 對於傅斯年的想法，朱家驊覆信如下：

北大應為國內最健全之大學，戰後使之恢復與擴充成為世界第一流大學，本人向所注意，二十一年曾一度努力之。抗戰開始時曾反對聯大制亦為此，近年來尤甚。現在亦無能為力者，即受聯合限制也。戰後北大之恢復，首先應在北平覓一兩千畝以上之校地，否則不足發展。馬神廟

³⁴ 「教育會議紀錄：魏德邁來華與教育界談話」，〈教育部長〉，《朱家驊檔案》，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檔案館藏，館藏號：301-01-09-002。朱家驊主持組織部期間的任務便是將黨務帶入校園，參見王奇生，〈戰時大學校園中的國民黨：以西南聯大為中心〉，《歷史研究》，2006年第4期（2006年8月），頁125-147。

³⁵ 「教育會議紀錄：魏德邁來華與教育界談話」，〈教育部長〉，《朱家驊檔案》，館藏號：301-01-09-002。

³⁶ 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中華民國史研究室編，《胡適來往書信選》，下冊（香港：中華書局，1983年），頁7。

³⁷ 黃麗安，《朱家驊學術理想及其實踐》，頁242-247、279。

³⁸ 「傅斯年」，〈人才人事〉，《朱家驊檔案》，館藏號：301-01-23-784。

舊地太小，更難開展。因本人之意，北大將來必須及早添設醫農工三院，此三院負責人、主要教授人選亦宜早為注意。³⁹

由此封回信可知，朱家驊也長期關注北大發展，1932年擔任教育部長時便曾給予協助，希望將北大打造成世界一流大學。在傅斯年建議的基礎上，朱家驊提出擴增校地和新增學院。

擴大大學校規模的前提是有穩定的經費，不久後周炳琳告知北大同仁，教育部將撥給北大特別費50萬元，朱家驊希望將增設學院一事儘早定案，囑咐北大同仁預先籌備。傅斯年隨後與鄭天挺談論復員事宜，鄭天挺提出10項要點，包括延攬人才、賦予三校法定地位，各院系的安排和對外合作等問題，顯示戰後北大擴充的企圖。⁴⁰ 朱家驊在姚從吾的建議下，特別寫信慰勞鄭天挺，誇讚北大遷至昆明後有賴其維繫。因1945年上半年蔣夢麟赴美考察教育，參加太平洋學術會議，行政事務多由鄭天挺負責。⁴¹ 鄭天挺的回信提到：「今後北大必增加新院系，始能更振舊院系之精神；必增加新教授，始能更促老教授之進步。」⁴² 鄭天挺掌理聯大總務長期間頗受師生好評，扮演協調者的角色，並與陳雪屏和姚從吾私交甚篤。朱家驊主持組織部時是陳、姚的直屬上司，藉此掌握聯大教授的情況，認為往後仍須借重鄭天挺的行政經驗。以上顯示朱家驊借重黨政和私人管道，參與對復員的討論。

就在復員規劃漸上軌道時，卻發生意外風波，係蔣夢麟改任行政院秘書長，隨後蔣介石和北大學人之間針對繼任校長人選，有不同意見。蔣夢麟就任秘書長一事，成為北大學人對其不滿情緒的宣洩出口。就公領域而言，聯大時期蔣夢麟的治校態度不若戰前積極，與清華協調校務時多所忍讓，加上爭取經費並不順

³⁹ 「傅斯年」，〈人才人事〉，《朱家驊檔案》，館藏號：301-01-23-784。本件檔案包含朱家驊草擬的回信，上有「照此發揮，復孟真（按：傅斯年之字）一月二十六日李莊第四號來函」等語，以及秘書謄寫的正式回函。此處引用草稿內容。

⁴⁰ 鄭天挺著，俞國林點校，《鄭天挺西南聯大日記》，下冊，1945年3月3日、3月7日、3月10日，頁1003-1007。

⁴¹ 鄭天挺著，俞國林點校，《鄭天挺西南聯大日記》，下冊，1945年3月19日，頁1009；「姚從吾」，〈人才人事〉，《朱家驊檔案》，館藏號：301-01-23-238。

⁴² 鄭天挺著，俞國林點校，《鄭天挺西南聯大日記》，下冊，1945年5月7日、5月13日，頁1033-1034、1036-1037。

利，使北大學人感受自身發展每下愈況。由公領域轉入私領域，蔣夢麟被認為外務太多，導致與同仁的互動減少，增加彼此隔閡。除此之外，蔣夢麟夫人陶曾谷遇事態度跋扈，亦增添眾人不滿。⁴³

蔣夢麟轉任行政院秘書長的紛擾，隨其返抵昆明向眾人解釋後有所緩解，但校長繼任人選仍需由蔣介石定奪。此時蔣介石屬意的人選並非胡適，而是傅斯年。傅斯年堅定的反共立場和主持史語所展現的行政能力，應為受蔣介石青睞的原因。根據傅斯年給夫人俞大綵（1904-1990）的信件以及周炳琳轉述，在北大同仁推舉下，朱家驊向蔣介石提出由胡適繼任校長，蔣介石未答，轉而詢問傅斯年是否適任。朱家驊將此事告知傅斯年，傅斯年隨即寫信上呈蔣介石，說明自己仍希望專心學術，並且高血壓病情日益嚴重，接任校長恐有不測。說明完自身情況，傅斯年轉達北大同仁一致希望胡適擔任校長，無論對內對外皆能有正面幫助。蔣介石認為胡適久居國外，對國內情形可能有所隔膜，後經朱家驊解釋，認為此事已有八、九成希望。⁴⁴至9月初，胡適出掌北大一事已經確定，只待胡適本人的意願。此段期間北大學人連同蔣介石連番敦請胡適就任，除了強調胡適對學校的重要性，並已涉及復員相關事宜。9月10日，胡適自知無法置身事外，致電教育部，認為蔣夢麟擔任秘書長只是暫時的安排，而傅斯年抱病代理令人感念。在此過渡期間，自己回國後可以暫時代理校長，等待蔣夢麟回任。⁴⁵北大繼任校長事，在胡適委婉同意下告一段落。

與此同時，教育部的復員工作未曾間斷，朱家驊多方洽詢在國外的中國學者尋求援助。例如電請胡適、蔣廷黻（1895-1965）、趙元任（1892-1982），協助在國外募集圖書儀器及高等教育經費。⁴⁶經與田培林商議，又分別致信陳之邁

⁴³ 有關聯大期間蔣夢麟的公私作為，以及轉任行政院秘書長後的「迎胡倒蔣」運動，嚴海建有深入分析。參見嚴海建，〈蔣夢麟與全面抗戰時期北京大學的變局〉，《中山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2年第3期（2022年6月），頁89-101。

⁴⁴ 鄭天挺著，俞國林點校，《鄭天挺西南聯大日記》，下冊，1945年8月28日，頁1088-1089；王汎森、潘光哲、吳政上主編，《傅斯年遺札》，第3卷（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2011年），頁1605-1607、1625-1626。

⁴⁵ 潘光哲主編，《胡適全集：胡適中文書信集》，第3冊（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2018年），頁495。

⁴⁶ 「戰後戰敗國圖書儀器分配問題」，〈教育部長〉，《朱家驊檔案》，館藏號：301-01-09-021。

（1908-1978）、趙元任、林語堂（1895-1976）、晏陽初（1893-1990），說明接任教育部長後，將多數心力放在生計問題，但真正關切的是提升高等教育、普及國民教育以及教育復員，希望眾人能夠多加宣傳。上述四人除晏陽初外，其餘三人皆與朱家驊有一定的交情，⁴⁷ 顯示教育復員工作一定程度仰賴人際網絡開展。值得一提的是，朱家驊提到黨團勢力經中央決議已退出校園，使學生專心向學，此一言論有避重就輕之嫌。⁴⁸ 戰爭勝利不久，蔣介石指示朱家驊和三青團書記長張治中（1890-1969），派遣該團重要幹部前往平津區各大學、中學切實組織，呈報具體辦法。⁴⁹ 至少就團務運作而言，仍未放棄經營校園。

1945年9月4日，國民政府明令胡適繼任北大校長，未到任前由傅斯年暫代。⁵⁰ 此前朱家驊邀請胡適參加全國教育善後會議，胡適以「去國八年，對國內教育學術完全隔膜，且已允兩處母校講學，不便廢輟」為由，建議由傅斯年代為出席。⁵¹ 此一說法雖有謙辭之意，卻呼應蔣介石的看法，胡適久未接觸國內教育行政事務，間接印證胡適出任校長的決定，主要是希望透過其聲譽和人脈領導北大。胡適回國以前，傅斯年、朱家驊和其他北大同仁奠定復員基礎，配合胡適在國外以個人名義延攬優秀人才，⁵² 爭取美國學校的合作，並接洽將老舊科學設備轉贈中國。

歐陽哲生指出傅斯年一生從事教育行政工作的經歷，屢在特殊時期擔任重要職務。⁵³ 在確認代理北大校長以後，擔心同仁產生誤會，但在胡適無法立即回

⁴⁷ 「教育總卷」，〈教育部長〉，《朱家驊檔案》，館藏號：301-01-09-001。

⁴⁸ 「教育總卷」，〈教育部長〉，《朱家驊檔案》，館藏號：301-01-09-001。

⁴⁹ 「蔣介石民國三十四年致俞鴻鈞等之手令登記簿」（1945年9月12日），〈一般資料—手令登錄（三十一）〉，《蔣中正總統文物》，國史館藏，典藏號：002-080200-00582-004。

⁵⁰ 王學珍主編，《北京大學紀事（1898-1997）》（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年），頁370。

⁵¹ 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中華民國史研究室編，《胡適來往書信選》，下冊，頁30-31。

⁵² 例如楊聯陞即曾受邀學成歸國後回北大服務，後因個人安排及政局變化未能實現。參見楊聯陞著，蔣力編，《哈佛遺墨》（北京：商務印書館，2013年修訂本），頁7-8。

⁵³ 歐陽哲生主編，《傅斯年全集》，第1卷（長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0年），頁53-54。

國，復員工作急待開展，只能盡力而為。⁵⁴ 傅斯年首先要凝聚北大的向心力，在致周炳琳的信中提到：

弟固跳火坑矣，而公等亦不當立於高峰之上，搬請以為樂也，除非大家努力，齊一步驟，此局不易維持也。北大之敵人多矣，隨時可來算賬，且此時不攘外即無以自立，此尤使弟鬥志奮發，而又不得不戒懼者也。⁵⁵

傅斯年自認能夠得到朱家驊全力支持，⁵⁶ 此時並非一味為北大爭取好處，還須謹慎處理具有利害關係的人事。他主動向清華大學校長梅貽琦（1889-1962）示好，希望聯大三校維持良好的合作，復員以後北大和清華同在北平，將有許多合作機會，北大尤須清華提攜。⁵⁷ 10月24日，聯大召開第350次常務委員會議，正式聘請傅斯年為常務委員。⁵⁸ 在聯大正式結束以前，傅斯年和梅貽琦經常協商復員事宜，同時又必須為自己學校的前途打算。⁵⁹

從朱家驊接掌教育部，至蔣夢麟出任行政院秘書長，由胡適接任校長，傅斯年先行代理，一連串人事安排從政界牽動到教育界，影響日後北大發展深遠。蔣介石在日記中常有人才不足的感慨。⁶⁰ 針對不同領域拔擢的人才，背後都有相應的人際網絡支持，容易與國民黨既有的派系結構相結合。戰爭期間蔣介石不斷考慮黨政重要職務的人選，但是每次人事改組都不出特定範圍之內。以更換教育部

⁵⁴ 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中華民國史研究室編，《胡適來往書信選》，下冊，頁48-49；鄭天挺著，俞國林點校，《鄭天挺西南聯大日記》，下冊，1945年9月3日，頁1092。

⁵⁵ 歐陽哲生主編，《傅斯年全集》，第7卷（長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0年），頁289。

⁵⁶ 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中華民國史研究室編，《胡適來往書信選》，下冊，頁49。

⁵⁷ 王汎森、潘光哲、吳政上主編，《傅斯年遺札》，第3卷，頁1631-1632。

⁵⁸ 北京大學等編，《國立西南聯合大學史料》，第2冊（昆明：雲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頁398。

⁵⁹ 梅貽琦著，黃延復、王小寧整理，《梅貽琦西南聯大日記》（北京：中華書局，2018年），頁203、208、214、269-270。

⁶⁰ 以1944年11月到1945年6月之間的日記為例，便有「事煩時艱，人多才少，處理為難，甚以一切組織尚未著手為憂也，然而建立建國基本問題，自今方知實施矣」、「此次大會要務，還在網羅人才，提拔人才，量用人才，只要能將人才使用得道，則一切組織訓練、設計考核皆易健全矣」等記載，餘不詳舉。參見《蔣介石日記》，1944年12月16日，上星期反省錄、1945年5月8日。

長為例，陳立夫任內安插CC系進入教育界而為人詬病，同一時期朱家驊亦負責推動校園黨務，且與另一位人選王世杰皆已擔任過部長。朱、王兩人皆係學者出身，隨著介入黨政運作機制越深，限制了人事改組的成效。然而朱家驊的黨政經歷，則成為北大復員的重要助力；北大學人堅持由胡適繼任校長，也顯示政學人際網絡的運作，有時蔣介石也不得不屈從學界的意見。

叁、平津區教育復員下的北大

1945年8月以後北大復員呈現雙軌並進。大後方昆明方面，聯大仍採行合議制，傅斯年接替蔣夢麟擔任常務委員，重要決策由定期召開的常務委員會議決議；另外還有教務會議和教授會議，協調三校之間的共識。收復區北平方面，復員進度在教育部主導下，由各校自行掌握，因而產生體制外的運作空間。此時傅斯年和梅貽琦經常往返昆明、重慶、南京、北平等地，與黨政高層會商。除了應付昆明學潮、反對教育甄審運動等突發事件，更重要的目的是疏通黨政關係，以利學校未來的發展。其中傅斯年、朱家驊和教育部平津區特派員沈兼士（1887-1947）、北平臨時大學補習班（以下簡稱補習班）主任陳雪屏之間的來往，對北大復員尤為關鍵。

首先國民政府教育復員政策的主要依據，一是1945年6月教育部參考中央設計局建議，擬定的教育復員計畫；二是9月20日至26日全國教育善後復員會議的決議。兩次商議的重點，包括專科以上學校應作合理分布，改善過去集中在少數沿海省份的現象；研擬後方學校遷移辦法，例如時程安排、規劃交通工具及路線；對於收復區各級學校教員及學生，應進行教育甄審。⁶¹ 教育甄審的對象，是戰爭期間位於淪陷區學校的教職員生，例如1939年1月日本扶持的華北臨時政府成立「北京大學」，被稱為「偽北大」。由於政府和主事者對甄審採取嚴格立場，事關教職員生的權利，引起極大反彈。政府順應情勢在各收復區設立臨時大學補習班，將「先甄審後補習」調整為「先補習後甄審」，以安頓收復區的失

⁶¹ 林桶法，《從接收到淪陷：戰後平津地區接收工作之檢討》（臺北：東大圖書公司，1997年），頁187-189；賀金林，《抗戰勝利後國民政府教育復員研究》，頁20-52。

學青年。⁶² 學生的學業成績是結業後分發各校的依據，多數學生希望能夠進入北大、清華等名校。⁶³ 補習班教職員也極力洗刷過去任職偽校的經歷，爭取續留機會。

其次，教育部在各收復區設立教育復員輔導委員會（以下簡稱輔導委員會），由教育部派遣特派員一人主持會務，下設委員五至九人，主要任務包括宣導中央教育政策及法令、宣慰收復區教育文化工作人員、接收國立性質及敵偽設立的教育文化機關事業、輔導地方教育行政機關，及私立教育文化機關辦理復員工作等，可知該會性質為各地區教育復員工作的統籌機關。⁶⁴ 學者林桶法引用鄭天挺回憶，說明輔導委員會和各校派遣的接收人員之間權責不清，以致北大出現「一校二接」的問題。⁶⁵ 透過晚近出版的鄭天挺日記和相關檔案，說明兩造當事人的聯繫並無阻礙，陳雪屏和鄭天挺遇到問題均能隨時溝通，亦未見輔導委員會阻礙北大接收的直接證據。由於當時教育部主要聯繫人是沈兼士和陳雪屏，與北大接收事務有關的聯繫對象為傅斯年，商議過後再傳達訊息給鄭天挺。惟鄭天挺或因站在第一線的實際感受，認為復員工作不如預期。

有關平津區的教育人事，在朱家驊一手主導下，北大背景的學人占據了重要職務。沈兼士和陳雪屏身居要職，便與朱家驊的支持有關。朱家驊和沈兼士的祖籍同為浙江吳興，幼年時曾受業於沈兼士兄長沈士遠（1881-1955）和沈尹默（1883-1971），受沈家兄弟影響而具有革命思想。⁶⁶ 戰前沈兼士擔任北大文學院院長，創辦國學研究所，在學術界具有一定聲望，抗戰期間在北平與輔仁大學

⁶² 有關淪陷期間偽北大的發展與戰後對該校教授的處置，參見賀金林，〈偽北京大學教授群體的來源與後方學界的回應〉，《北京社會科學》，2017年第8期（2017年8月），頁51-60。教育甄審隱含忠奸之辨的價值判斷，參見羅久蓉，〈抗戰勝利後教育甄審的理論與實際〉，《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22期（上）（1993年6月），頁205-231。

⁶³ 北京大學校史研究室編，《北京大學史料（1946-1948）》，第4卷（北京：北京大學，1993年），頁406。

⁶⁴ 〈接收敵偽文教機關 中宣部派定各區特派員 教部輔助收復區教育復員 全國分六區主持人選發表〉，《大公報》，重慶，1945年8月30日，版3。

⁶⁵ 林桶法，〈從接收到淪陷：戰後平津地區接收工作之檢討〉，頁194-195。鄭天挺的回憶，參見鄭天挺，〈自傳〉，收入吳廷璆編，《鄭天挺紀念文集》（北京：中華書局，1990年），頁704。

⁶⁶ 胡頌平，《朱家驊年譜》（臺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69年），頁3-4。

同仁組織華北文教協會，聯絡北方文教界，協助青年脫離淪陷區，至1942年12月離開北平，擔任教育部專任委員。1943年8月，傅斯年推薦沈兼士繼任史語所所長，但因胡宗南（1896-1962）邀請沈兼士前往陝西，而且沈仍心繫北方情勢發展而作罷。⁶⁷ 國民黨六全大會召開前，蔣介石希望新一屆中執委能夠多納入文教界人士，指示朱家驊開列名單。沈兼士名列其中，卻因為名額有限而未進入圈選名單。朱家驊上呈蔣介石，提到「鈞座留意學者，使多參加中央黨務，沈同志實為上選」，但最終仍未獲選。⁶⁸ 以上資料顯示沈兼士和朱家驊具有同鄉情誼和師友關係，加上沈兼士對敵後工作的貢獻，因此得到特別關照。戰爭結束不久，沈兼士致函朱家驊，希望憑藉過去的基礎參與收復華北文教工作，朱家驊表示贊同，指示沈兼士速往北平。⁶⁹

這段期間朱家驊接收到大量建言，其中戰時接觸黨政事務並與其有私交者，如傅斯年、姚從吾、錢端升（1900-1990）等人的建議，有一定的影響力。對於前往收復區接收北大的人選，曾屬意陳雪屏。陳雪屏與妻子相別九年，戰後亟欲返回北平相見。姚從吾與其深談過後，向朱家驊分析未來可能的發展：

頃數與雪屏兄談，知彼對吾師之堅邀（按：指出任高等教育司司長事）實深感動。惟彼之妻子久困北平，別已九年，目下歸心似箭，一時自無意再就他事。彼云已回覆孟真，云暫時欲先回北平，惟生默察各方情形，因敵人之投降，聯大準備北還，雪屏處境實也與前大異。兆民（按：康澤之號，時任三青團中央幹事會幹事）去職一也；聯大復校，團務根本停止二也；北大無師範學院三也。彼□□歸四也。此刻再以彼代趙太侔兄，實大有可能。生愚見以為北平天津為世界文化重心之一，吾師故舊亦多，雖久淪敵手，而堅苦卓絕與敵偽撐拒者，實大有其人，……允宜由先生簽呈總裁，早日選派二、三教育界名人而又與吾黨有關係者，如兼士先生、雪屏、伯蒼、慰堂等，隨接收人員代表中央

⁶⁷ 「人事簽呈」，〈教育部長〉，《朱家驊檔案》，館藏號：301-01-09-262；「與傅斯年往來函電」，〈中研院總幹事、院長〉，《朱家驊檔案》，館藏號：301-01-07-012。

⁶⁸ 「人事簽呈」，〈教育部長〉，《朱家驊檔案》，館藏號：301-01-09-262。第六屆中央執行委員及候補名單，參見劉維開編輯，《中國國民黨職名錄》（臺北：中國國民黨黨史會，1994年），頁179-182。

⁶⁹ 「沈兼士」，〈人才人事〉，《朱家驊檔案》，館藏號：301-01-03-203。

專往慰問，並宣慰平津愛國青年。……三兩月後，再任彼為高等教育司長，當無問題。且對鈞部將來接收平津各大學亦至有幫助也。⁷⁰

姚從吾考慮未來陳雪屏在北大復員後的地位不穩，接掌高等教育司具有誘因，但需要先讓陳雪屏安頓家內事務。此時賦予宣慰北平文教界的名義，能夠滿足他急待返回北平的心情。姚從吾建議前往北平宣慰的四位人選，皆為北大出身，且與國民黨關係密切。陳雪屏、田培林（字伯蒼）、蔣復璁（1898-1990，字慰堂）三人畢業於北大哲學系，日後赴國外深造。⁷¹ 陳雪屏致傅斯年的回信提及回北平不僅可以為北大辦理接收，而且能協助其他教育復員事宜。⁷²

朱家驊並未明確答覆姚從吾，僅提及陳雪屏和田培林均須參加全國教育善後復員會議；至於將來派赴北平接收的人選，北大同仁均推薦鄭天挺參加。⁷³ 在此同時，朱家驊請鄭天挺前往重慶面洽。鄭天挺內心有所掙扎，湯用彤勸他勿北上，認為接收文化機關雖然重要，但學校的發展更為關鍵。言下之意，鄭天挺一旦離開昆明，北大在聯大中將受人欺凌。鄭天挺深受感動，但最終選擇北上有迴避代理校長職務的考量，不便向旁人明言。⁷⁴

9月4日，鄭天挺在重慶拜會沈兼士，談到輔導委員會人事問題。原先擬定的人選為鄭天挺所熟識，後來加入黨部人員而有所更動。⁷⁵ 9月6日，鄭天挺與傅斯年一同拜會朱家驊，得知委員會的確切名單：

十時詣孟真，值驢先（按：朱家驊之字）先生派車來接，遂同往。既晤，劈頭一語，即問何時啟程。實則名單中是否有余，余尚不知，且孟真、兼士亦不知也。余答以俟交通工具而定。驢先先生云，此事由行政院統籌，可速往求。……葉審之、吳正良送來人事處公文一件，內附平津區教育復員輔導委員會名單，主任委員沈兼士，委員張懷、董洗

⁷⁰ 「姚從吾」，〈人才人事〉，《朱家驊檔案》，館藏號：301-01-23-238。

⁷¹ 參見徐友春主編，《民國人物大辭典》，頁157-158、431、1045、1378。

⁷² 「姚從吾」，〈人才人事〉，《朱家驊檔案》，館藏號：301-01-23-238。

⁷³ 「姚從吾」，〈人才人事〉，《朱家驊檔案》，館藏號：301-01-23-238。

⁷⁴ 鄭天挺著，俞國林點校，《鄭天挺西南聯大日記》，下冊，1945年8月24日、8月28日、8月29日、9月1日，頁1087-1089、1091。

⁷⁵ 鄭天挺著，俞國林點校，《鄭天挺西南聯大日記》，下冊，1945年9月4日，頁1093。

凡、郝任夫、王任遠、徐侍峰、余及鄧以蜚、英千里八人。前傳張子高竟無之，此其兼士先生所云名單任意改動者歟？余所識僅張、董、鄧、英。⁷⁶

此份名單中鄭天挺和清華哲學系教授鄧以蜚（1892-1973）分別為北大和清華代表，其他人則具有敵後工作的經驗。其中王任遠（1910-1996）和郝任夫（1900-？）屬於黨政系統，其餘張懷（1896-1987）、董洗凡（1900-？）、徐侍峰（1888-？）、英千里（1900-1969）四人，戰爭期間與沈兼士共同參與華北文教協會工作。⁷⁷由此推斷，朱家驊主要考量與華北文教界的親疏關係，以及戰爭期間的敵後貢獻，黨部人員須占有一定比例，在此基礎上再安插北大、清華兩校成員，接收人事的複雜性可見一斑。9月28日，教育部平津區特派員辦公處成立，名單即如前述。⁷⁸

收復區教育人事的安排，尚須考慮到聯大的校務運作。錢端升向朱家驊說明，以該校教職員的重要性而論，首要為梅貽琦，鄭天挺次之，再者依序為化學系主任楊石先（1897-1985）、物理系教授吳有訓（1897-1977）、經濟系主任陳岱孫（1900-1997）和周炳琳。假如梅貽琦留在北平，則鄭天挺必須返回昆明。北平初期的復員工作，可由教育部委託陳雪屏辦理，二、三個月後即可由鄭天挺偕同總務部同仁北上接替。錢端升進一步分析陳雪屏前往北平的好處：

雪屏以家庭關係，急於返平，渠人事尚熟，而其地位亦無須允許或拒絕某甲或某乙之迫北大，在初期實較毅生（按：鄭天挺之字）為方便。至於高等司長一事，鄙意俟雪屏自平南返後，不妨徐商，此時逼之，必不應允，此亦一種考慮也。又梅先生如即可返昆，而毅生又願即北上，則先生或亦設法使雪屏、毅生均獲北上，總之聯大目前決不可令梅先生及毅生同離。⁷⁹

⁷⁶ 鄭天挺著，俞國林點校，《鄭天挺西南聯大日記》，下冊，1945年9月6日，頁1094。

⁷⁷ 王任遠、郝任夫、徐侍峰、英千里等人經歷，參見徐友春主編，《民國人物大辭典》，頁52、586、665、712；張懷和董洗凡的經歷，收入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數位資料庫：<http://mhdb.mh.sinica.edu.tw/>（2020/8/26點閱）。

⁷⁸ 〈各區教育復員輔導委員會委員名錄〉，《教育部公報》，第17卷第9期（1945年9月），頁23。公報上董洗凡之名誤植為黃洗凡。

⁷⁹ 「錢端升」，〈人才人事〉，《朱家驊檔案》，館藏號：301-01-23-793。

錢端升所言，可以看出鄭天挺在聯大的地位難以取代，與湯用彤看法相近。陳雪屏的黨政關係遠較鄭天挺深厚，在接收初期可以減輕外界的干擾。最終的安排符合錢端升的建議，由陳雪屏和鄭天挺一同北上，也是尊重兩人意向。10月17日，聯大第349次常務委員會議決議，鄭天挺奉北大之命前往北平接收；10月19日，教育部公布陳雪屏為補習班主任，鄭天挺擔任第二分班主任兼代總務長。⁸⁰ 綜合而言，北大的復員與其他學校相比，在中央層級有朱家驊支持，平津區教育人事多與北大有關，是一有利關鍵。

鄭天挺和陳雪屏銜教育部之命北上，接收華北文教機關和籌辦補習班，是教育復員的重點工作，兩人並且肩負北大復員的任務。當鄭天挺在重慶等候前往北平，昆明方面謠傳他此行是替蔣夢麟處理房產，鄭天挺為此在日記中宣洩不滿：「余此行本為整理財產，但所整理者為中華民國之財產，為北京大學之財產，非個人之財產也。」⁸¹ 可見鄭天挺清楚自己的職責所在。然而兩人都具有雙重身分，給予後方北大同仁權責不清的感受。北大復員期間因訊息傳遞產生的誤會，同仁內部意見紛雜，反映戰後國民政府接收的人事紛亂，還涉及補習班教職員生的處置，引發雙方誤會和隔閡。

朱家驊注意到北大內部的不同意見，指示沈兼士、陳雪屏、鄭天挺三人表面上寬大處理，實際仍保持大幅淘汰教職員和從嚴甄審的原則。羅久蓉探討教育甄審聚焦於忠奸之辨，指出傅斯年在道德感驅使下，對待偽教職員生主張強硬；教育部採取折衷的立場，朱家驊的想法亦隱含著價值判斷。⁸² 傅斯年曾向俞大綵傾

⁸⁰ 北京大學等編，《國立西南聯合大學史料》，第2冊，頁397；鄭天挺著，俞國林點校，《鄭天挺西南聯大日記》，下冊，頁1115、1125。北平補習班的人事安排如下：主任陳雪屏、總務長鄭毅生，教導長張富歲（1907-1946），下設八個分班：第一分班理學院，主任陳雪屏兼任、第二分班文學院，主任鄭天挺兼任、第三分班法學院，主任張佛泉（1908-1994）、第四分班農學院，主任張富歲兼任、第五分班工學院，主任張富歲兼任、第六分班醫學院，主任馬文昭（1886-1965）、第七分班師範學院，主任湯茂如，第八分班為藝術專科學校。參見〈各地臨時大學補習班先後成立〉，《教育通訊》，第1卷第1期（1946年），頁16；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中華民國史研究室編，《胡適來往書信選》，下冊，頁103-104。

⁸¹ 鄭天挺著，俞國林點校，《鄭天挺西南聯大日記》，下冊，1945年9月10日，頁1096-1097。

⁸² 羅久蓉，〈抗戰勝利後教育甄審的理論與實際〉，《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

吐苦水，提到「騷先好與我商量，而十之七八不聽，他要大整頓教育，我主張妥協，騷先罵我妥協壞事。然而外人不知也，以為他的一切事由我負責。」⁸³ 傅斯年的說法和兩人給予外界的印象差距甚大，雖然帶有個人的主觀感受，卻能夠得知兩人經常商討教育方針；同時公開場合的言論，未必能夠代表當事人內心的想法。

著眼於實務面，兩人考慮到處置補習班對北大未來發展的影響。朱家驊給沈兼士等人的指示中，明白提到事關北大聲譽，必須嚴肅對待：「由兄等慎選忠實之黨員團員擔任學生會，逐漸淘汰可受偽校教職員鼓動之分子，以重學業。弟不能對不起教育界，尤不能為北大貽羞。」⁸⁴ 同時朱家驊要求儘速縮減補習班人事，以撙節經費；指示高等教育司，注意各地補習班學生結業後的分發問題，應當預先規劃。⁸⁵ 傅斯年則隨著復員工作不斷推進，急於前往北平。昆明方面在學潮平息以後，餘下問題為遷校規劃和三校之間的財產分配。傅斯年認為即使不在昆明坐鎮，北大學人仍有能力解決；北平方面則憂心補習班鳩占鵲巢，北大的存亡取決於能否如期遷回北平。⁸⁶ 1946年5月4日，傅斯年抵達北平，和陳雪屏、鄭天挺一起處理復員工作，提出四點原則：（一）政府及學校當局應做之事先做到；（二）必須遵守教育部法令；（三）不接受學生請願，不與談條件，只能開導勸退；（四）北大要辦實實在在的大學，恢復當年的紀律。⁸⁷

6月1日，蔣介石先在上午召見華北黨團幹部，指示補習班事應寬大處理。陳雪屏總結學生的要求，計有三點：（一）發給無臨時字樣之正式文憑；（二）第五分班獨立或由一校接辦；（三）四、五分班請求分派實習，據此向朱家驊請示。⁸⁸ 下午蔣介石與傅斯年遊覽北平大佛山文天祥祠，承諾會盡力協助北大，扶

22期（上），頁230。

⁸³ 王汎森、潘光哲、吳政上主編，《傅斯年遺札》，第3卷，頁1634。

⁸⁴ 「平津區教育復員及輔導會工作」，〈教育部長〉，《朱家驊檔案》，館藏號：301-01-09-045。

⁸⁵ 「平津區教育復員及輔導會工作」、「教育部長條諭」，〈教育部長〉，《朱家驊檔案》，館藏號：301-01-09-045、301-01-09-047、301-01-09-020。

⁸⁶ 王汎森、潘光哲、吳政上主編，《傅斯年遺札》，第3卷，頁1682-1683。

⁸⁷ 「傅斯年」，〈人才人事〉，《朱家驊檔案》，館藏號：301-01-23-784。

⁸⁸ 「蔣介石接見傅斯年垂詢北京大學復員情形」（1946年6月1日），〈事略稿本—民國三十五年六月〉，《蔣中正總統文物》，典藏號：002-060100-00213-001；鄭天挺著，俞

植教育事業。傅斯年認為蔣介石誤信傳言，以為教育部和北大未能妥善收容補習班學生，因此主張寬大處理。其實教育部擬有多種辦法，北大並且已收容2,000名補習班學生。傅斯年抱怨朱家驊尚未接到他的消息，便回覆陳雪屏從寬處理，建議朱家驊日後給陳雪屏的訓令，應先詢問他的意見。⁸⁹其實以北大代理校長身分提出上述要求，無疑逾越自己的權限，卻能看出兩人關係匪淺。朱家驊指示傅斯年與陳雪屏詳細討論解決辦法，在與鄭天挺商議後，主要問題為第五分班工學



圖1、蔣介石與傅斯年遊覽北平文天祥祠合影

資料來源：「蔣介石與北大校長傅斯年瞻仰文天祥祠」（1946年6月1日），〈領袖照片資料輯集（五）〉，《蔣中正總統文物》，典藏號：002-050101-0007-096。

國林點校，《鄭天挺西南聯大日記》，下冊，1946年6月2日，頁1182；「平津區教育復員及輔導會工作」，〈教育部長〉，《朱家驊檔案》，館藏號：301-01-09-047。

⁸⁹ 「傅斯年」，〈人才人事〉，《朱家驊檔案》，館藏號：301-01-23-784。

院學生反對清華、北大兩校合辦（見下節討論）和畢業證書的發放細節。事後第五分班依照傅斯年建議併入北洋大學；畢業證書問題仍遵照蔣介石指示，從寬辦理。⁹⁰

7月1日，補習班八個分班全部結束，教職員處理辦法如下：（一）戰前任該院校教職員者，概予留聘；（二）一部分發至東北、河南、安徽、山東等處，由教育部負責介紹聘任；（三）如至8月份尚未確定聘任者，由教育部發給遣散費兩個月。教育部並指示北大按照資歷接收部分教職員。⁹¹ 另根據10月9日的教務會議報告，補習班分發至北大学生（1,509人）和聯大自願入北大者（709人）均被視為舊生。⁹² 舊生來源如表1。

表1、北大舊生來源統計

聯大自願入北大者				
文學院	法商學院	理學院	工學院	
284人	265人	88人	72人	
補習班分發北大者				
文學院	理學院	法學院	醫學院	農學院
211人	113人	329人	569人	340人

資料說明：「聯大自願入北大者」係根據「國立西南聯合大學分入三校學生人數統計表」，工學院項下「其他」欄位計72人，並且說明：「其他一項包括研究生先修班保送師電專及借讀試讀甄試取錄各生。」由此推斷，實際進入北大的聯大工學院學生應該更少。

資料來源：「教育部特設北平臨時大學分發國立北京大學學生人數統計表」、「國立西南聯合大學分入三校學生人數統計表」，北京大學校史研究室編，《北京大學史料（1946-1948）》，第4卷，頁315、320。

由表1可知，北大共接收補習班學生1,562人，傅斯年對蔣介石的說詞雖有高

⁹⁰ 「平津區教育復員及輔導會工作」，〈教育部長〉，《朱家驊檔案》，館藏號：301-01-09-047；「蔣介石民國三十五年致盧漢等手令登記」（1946年4月11日），〈一般資料—手令登錄（三十四）〉，《蔣中正總統文物》，典藏號：002-080200-00585-002。

⁹¹ 王學珍主編，《北京大學紀事（1898-1997）》，頁383；北京大學校史研究室編，《北京大學史料（1946-1948）》，第4卷，頁229。

⁹² 王學珍主編，《北京大學紀事（1898-1997）》，頁394。

估，但補習班學生占學生總人數（3,507人）約45%，仍是相當高的比例。補習班學生經由考試分發，加上教育部會評估各學校的負擔能力，因此學科分布情況相對平均。相較之下，聯大學生可以自由選擇進入北大、清華或南開，進入北大的學生以文法學院占大宗，證明該校在文法領域的優良傳統，確實能吸引同類學生，聯大工學院學生則絕大多數選擇進入清華。⁹³ 根據1946年第一學期北大各學院學生人數統計，計文學院666人、理學院354人、法學院834人、醫學院610人、農學院366人、工學院140人。⁹⁴ 工學院在六個學院中人數最少，間接影響擴增學院時的資源分配。

傅斯年主張北大接收補習班學生人數不宜過多，但北大是教育部安排下承接補習班資源的主要大學，倘若只接收設備和土地，將學生排除在外，勢必引起其他學校抗議。除此之外，教育甄審和補習班分發的過程，是否有排除真正人才的可能，值得進一步思考。在第一線的鄭天挺，聽聞聯大教授的續聘過程和對偽校教員的質疑，感嘆提到「學校選聘教授不依學問為標準，前途必無進步，若雜以感情，尤非學校之福也。」⁹⁵ 大學選聘教授不以學問為首要考量，連同教育復員政策強調忠奸之辨，防堵共產黨勢力進入校園，都可能錯失吸納收復區人才的機會。長遠來看，對戰後的社會重建不無影響。

肆、與國家政策配合：擴增醫農工學院

國民政府規劃戰後教育發展的方向，是重點發展醫學、農業、工業在內的實用學科，歷經不同單位研擬、會商。1945年7月，中央設計局奉蔣介石指示，擬訂「科學技術指導方案」，主旨說明政府應設立專責機構，使科學發展與國家建設互相配合，釐清各項學科發展的輕重緩急，作有組織的分工，避免資源浪費。由方案中可以看出對醫農工學科較為重視，任務要點單獨列出「調查工礦農醫各

⁹³ 參見北京大學等編，《國立西南聯合大學史料》，第3冊（昆明：雲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頁571-604。

⁹⁴ 北京大學校史研究室編，《北京大學史料（1946-1948）》，第4卷，頁316-317。

⁹⁵ 鄭天挺著，俞國林點校，《鄭天挺西南聯大日記》，下冊，1946年4月27日，頁1169。

業之癥結技術問題，交由專業或專題小組會研究，經大會審議施行。」⁹⁶ 此項方案由侍從室轉呈教育部審核，期間蔣介石並指示朱家驊研擬今後發展應用科學的步驟，會同中研院擬訂十年計畫與逐年進度。⁹⁷ 歷經一年有餘，朱家驊向蔣介石呈報「應用科學十年計劃草案」，以培養工業化專門人才為主，分為應用研究人才與學理研究人才。對應高等教育現況，提到各大學所培養的醫農工人才不敷使用，根本之道必須解決師資短缺的問題。⁹⁸ 朱家驊曾在國民參政會報告，指出專科以上學校人數從戰前41,000餘人增加到78,000餘人，加上接收補習班學生10,000餘人，現有學校不敷容納，為因應將來各項技術人才的需要，應充實農工醫學科教育。⁹⁹

醫農工定調為重點發展學科，戰爭後期朱家驊建議北大儘快籌設醫農工學院，已如前述；教育部並有將資源集中於幾間重點大學的傾向。1944年12月14日，蔣介石指示教育部統籌專科以上學校理工農醫方面的師資及儀器，務求資源能夠集中，以發揮最大功效。¹⁰⁰ 在教育資源有限的情況下，朱家驊有意識地請北大預先準備，以利日後發展，北大學人也希望擴張現有的學院。戰爭結束後不久，文學院教授談話會商討擴充系所和師資，即有取代日本在國際學術界地位野心。¹⁰¹

全國教育善後復員會議結束後，朱家驊呈報蔣介石指示的商議要點，未來五年的建設重點為改進農業和發展輕工業，以解決民生問題，並做為發展重工業的基礎。建議中提到應大力整頓現有的農學院，使其肩負起發展農村社會經濟的責

⁹⁶ 「熊式輝呈蔣介石為呈擬科學技術指導方案草案」（1945年7月9日），〈工業建設（八）〉，《國民政府》，國史館藏，典藏號：001-112000-00008-004。

⁹⁷ 「蔣介石指示朱家驊發展應用科學注重電化教育」（1946年1月20日），〈事略稿本—民國三十五年一月〉，《蔣中正總統文物》，典藏號：002-060100-00208-020。

⁹⁸ 「朱家驊呈蔣介石為呈擬發展應用科學十年計畫草案」（1946年11月4日），〈工業建設（八）〉，《國民政府》，典藏號：001-112000-00008-006。

⁹⁹ 「教育施政報告」，〈教育部長〉，《朱家驊檔案》，館藏號：301-01-09-005。

¹⁰⁰ 「蔣介石電朱家驊應注重專科以上各校理工醫農方面之師資及儀器之利用」（1944年12月14日），〈事略稿本—民國三十三年十二月〉，《蔣中正總統文物》，典藏號：002-060100-00195-014。

¹⁰¹ 北京大學校史研究室編，《北京大學史料（1937-1945）》，第3卷（北京：北京大學，1993年），頁297-299。

任；還要能因地制宜，配合全國各地區農產特色，改善農民的經濟生活。工學院方面可以增設建築系，研究中國鄉村、都市建築及市政設計。¹⁰² 此點呼應傅斯年希望戰後北大工學院發展的方向。整體而言，朱家驊建議的主旨為配合工業建設和解決民生問題。傅斯年參與該次會議，在衡量北大的條件之後，向胡適說明設立醫農工學院的想法：

增設學院事，孟鄰先生（按：蔣夢麟）當年有意於工學院，但今日工學院絕難請得好教員，花錢太多，人家比我們早二十年。此時上來一下，恐怕要出醜，請先生斟酌一下。土木、機械等系，乃工學院之基本，請教員最難。

農學院似甚有意思，在華北之將來，其用無窮，我們不能老坐而論道，我們總當與人民接近，總當負起改造社會的責任來，而且我們學校最大的毛病，是：學生一入學，便走大街，英文永遠學不好。我想大可把一年級搬到城外去受嚴格訓練，有個農學院，可以開這個端。農學院最費錢的事是地，這似乎有辦法。金大農學院院長章之汶，極有幹才，可以捨去一切來做我們的院長。農具、車輛，似可借重善後救濟總署，不過清華也要同時辦，正商量中，或者出於「分工合作」。

醫學院極有意思，也有學術上之價值，但太花錢了，怕辦了影響其他太大。驢先堅決主張我們辦。北平日本人留下設備也很好。目下教育部派吳憲去視察。吳憲似不是辦這事的人，這事也在不上不下中。¹⁰³

傅斯年對於三個學院有不同看法，首先北大辦理工學院的基礎不夠，師資不易聘請，特別是和領先二十年的清華相比，是否要投入大量資源似可斟酌。農學院配合華北情勢，有發展的價值，並能改善學生惡習，有金陵大學農學院院長章之汶（1900-？）可以提供協助。醫學院雖然也具有發展價值，問題在於需要龐大的經費，恐怕排擠其他學院的發展。信中提到的吳憲（1893-1959）是中央衛生實驗院營養研究所所長，戰後奉朱家驊之命前往平津視察醫學教育情況，曾是北大

¹⁰² 「朱家驊呈蔣介石全國教育善後復員會議商討各案」（1945年10月12日），〈革命文獻—政治：政經重要設施（一）〉，《蔣中正總統文物》，典藏號：002-020400-00036-009。

¹⁰³ 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中華民國史研究室編，《胡適來往書信選》，下冊，頁50-51。

醫學院院長人選。¹⁰⁴ 傅斯年根據辦理的難易程度，提出發展的優先次序為農學院、醫學院和工學院，請胡適定奪。其中特別提到清華也爭取辦理農學院，令教育部感到為難。¹⁰⁵ 考慮到辦農學院要借重善後救濟總署提供設備，主持人蔣廷黻出身清華，儘管和傅斯年、胡適等人皆有私交，但也沒有把握北大能夠占到上風。傅斯年認為聯大時期北大與清華合作，好處被對方占盡，如今再沒有退讓的理由。這封信點出北大和清華長期在教育場域的競爭。聯大時期，兩校在公開場合強調團結一致，私底下的本位立場仍十分明顯。例如鄭天挺聽到同仁饒毓泰抱怨北大現狀不如清華，告以「北大之聲譽，本由全體同人共同努力而蒸蒸日上，今日亦惟共同努力以維持之，不應責之於一二人，更不應責之於一二事。」¹⁰⁶ 回顧兩校從戰時到戰後的互動，不應忽略彼此既合作又競爭的雙重面向。

此時清華也正積極籌劃復員事宜。10月6日，梅貽琦攜帶清華院系充實草案與朱家驊商談，朱家驊沒有明確答覆，只提到將來須作全盤合理的調整。¹⁰⁷ 北大和清華都希望辦理農學院，10月30日，鄭天挺面見朱家驊，記錄兩校呈報復員計畫的後續發展：

二時至教育部謁駱先先生，謂北平大學醫學院決定劃入北京大學，工、農兩院尚未定。日前部中會議，司中主張以工、農劃入清華大學，因本有工學院及農業研究所也，朱公以他語亂之，令改日再談。同時，清華大學有一計劃書上部，所請亦同，而孟真亦有一函致朱公，述北京大學今後設置院系情形，主張工、農不與清華重複。立武於孟真函上批交司參考，駱先先生見之，乘機點破，另加長批，將醫劃入北大，北大工院既主應用，可先設理工學院，置應用化學各系。於農未批，只書清華無農學院，何以有農學研究所數語。¹⁰⁸

鄭天挺日記顯示朱家驊對待北大和清華的不同態度。因為清華有農工方面的基

¹⁰⁴ 「平津區教育復員及輔導會工作」，〈教育部長〉，《朱家驊檔案》，館藏號：301-01-09-047。

¹⁰⁵ 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中華民國史研究室編，《胡適來往書信選》，下冊，頁51。

¹⁰⁶ 鄭天挺著，俞國林點校，《鄭天挺西南聯大日記》，上冊，1941年4月29日，頁415。

¹⁰⁷ 清華大學校史編寫組，《清華大學校史稿》（北京：中華書局，1981年），頁434；梅貽琦著，黃廷復、王小寧整理，《梅貽琦西南聯大日記》，1945年10月6日，頁209。

¹⁰⁸ 鄭天挺著，俞國林點校，《鄭天挺西南聯大日記》，下冊，1945年10月21日，頁1121。

礎，高等教育司考慮將補習班農工學院畫入清華，卻遭到朱家驊搪塞，並利用公文傳遞之便，強化北大擴建院系計畫的可行性，有意忽略清華的擴校計畫。

北大復員除本身計畫外，還有朱家驊在中樞幫助；而清華教授常有反對政府的言論和行動，是清華難以得到支持的原因。1946年2月17日，朱家驊與梅貽琦會談，除了關心清華復員後的設備情況，並提醒聞一多（1899-1946）等人的舉動對清華不利。¹⁰⁹ 蔣介石曾詢問聯大各校的復員進度，要朱家驊與梅貽琦一同商討，整頓清華的學術風氣，朱家驊指出教授的問題必須解決。¹¹⁰ 日後蔣介石再次致電朱家驊，希望速與梅貽琦研擬辦法呈報，顯示對此事的關切。朱家驊回覆自己密切注意清華教授的動向，設法降低聞一多、吳晗（1909-1969）、張奚若（1889-1973）、潘光旦（1899-1967）的影響力和外界的同情，俟適當時機予以解聘。¹¹¹ 對於蔣介石的指示，梅貽琦認為確保生活安定和充實研究設備，學風問題便能迎刃而解。6月25日，蔣介石詢問復員情況，談及教授言行時，朱家驊希望清華主要負責人皆為穩健分子。梅貽琦則認為政府當局眼中的異議分子，「以往在學術上頗有成績，最近之舉動當係一時之衝動，故極希望能於規勸之中使其自行覺悟，則其後來結果必更好。」¹¹² 綜合梅貽琦的回覆，認為清華教授的言行是受現實環境所逼，政府要做的不是整頓學風，而是維持社會穩定。

當清華忙於應付政治上的壓力，北大則受惠於政治因素，復員工作持續推進。1946年2月19日，教育部電復傅斯年，明令偽北大校產均歸該校接收，平津區特派員辦公處指示亦同。¹¹³ 從5月到7月，傅斯年接洽過的單位包括敵偽產業處

¹⁰⁹ 梅貽琦著，黃延復、王小寧整理，《梅貽琦西南聯大日記》，1946年2月17日，頁239。

¹¹⁰ 「蔣介石民國三十五年致張治中等手令登記」（1946年1月12日），〈一般資料—手令登錄（三十四）〉，《蔣中正總統文物》，典藏號：002-080200-00585-001；梅貽琦著，黃延復、王小寧整理，《梅貽琦西南聯大日記》，1946年5月27日，頁261。

¹¹¹ 「蔣介石民國三十五年致盧漢等手令登記」（1946年4月11日），〈一般資料—手令登錄（三十四）〉，《蔣中正總統文物》，典藏號：002-080200-00585-002；「工作簽呈」，〈教育部長〉，《朱家驊檔案》，館藏號：301-01-09-263。

¹¹² 梅貽琦著，黃延復、王小寧整理，《梅貽琦西南聯大日記》，1946年6月14日、6月25日，頁266、270-271。此後不到一個月的時間，聞一多被暗殺，其餘三人於1949年政權易手之時，選擇留在中國。

¹¹³ 王學珍主編，《北京大學紀事（1898-1997）》，頁377。

理局、第十一戰區司令部、北平市日人房產接收委員會、北平行營等處。¹¹⁴ 其中與教育部青年就業輔導處交涉時，該處負責人曹敏拒絕將旗下房產撥交北大。教育部秘書沙孟海向曹敏說明該處本為臨時性質，應以教育復員為優先考量，甚至提到朱家驊與傅斯年的交情，以及朱家驊對北大的情感。¹¹⁵ 此一案例顯示被傅斯年詢問的單位，可能迫於朱家驊的壓力交出房產。傅斯年向朱家驊提到自己要了不少房子，卻苦無整修經費，可以佐證。¹¹⁶

擴大學校所需的土地漸有著落，新學院的規畫仍費斟酌。北大1946年度工作計畫書中提到：「擬恢復之工學院，為避免與左近之工學院重複起見，擬暫設四系，如經費不充裕，先自一年級辦起，北平補習班工科之學生可轉入他校。擬恢復之農學院，實為配合北方各省之需要而建議，在建國步驟中有其必需。既屬創辦性質，開始設備須予充實。」¹¹⁷ 顯示北大內部認為工學院規模不宜過大，農學院則為配合北方各省農業發展，將爭取更多經費。接下來幾次談話會，持續研擬擴增院系計畫，農學院方面包含交涉新市區做為教職員宿舍、向農林部請求撥交一百頭乳牛、設備費用暫由復員費中支用等；醫學院方面則組織籌備委員會、規定教授在外兼職的限制辦法和待遇問題。¹¹⁸

4月5日，朱家驊召集北大和清華教授，與教育部同仁一同商議補習班接收問題。其中第四分班交給北大辦理農學院，性質等於另起爐灶；工學院分班號稱清華、北大合辦，實際上由清華負責，財產歸清華所有。傅斯年提到接收農、工學院分班，要保持北大不受影響。醫學院的情況較為複雜，因所需經費甚巨，在開辦前兩年預算和人員應使其獨立，設立教授會，院長人選由北大校長商請教育部同意後聘任。行政方面則劃歸理、醫兩學院共同設置之下，由北大直接管理，經費列入北大項下。以上規劃預計在兩年內回歸正軌。¹¹⁹

¹¹⁴ 歐陽哲生主編，《傅斯年全集》，第7卷，頁305-307、309-311。

¹¹⁵ 「平津區教育復員及輔導會工作」，〈教育部長〉，《朱家驊檔案》，館藏號：301-01-09-047。

¹¹⁶ 「傅斯年」，〈人才人事〉，《朱家驊檔案》，館藏號：301-01-23-784。

¹¹⁷ 北京大學校史研究室編，《北京大學史料（1937-1945）》，第3卷，頁297。

¹¹⁸ 北京大學校史研究室編，《北京大學史料（1946-1948）》，第4卷，頁1060-1063。

¹¹⁹ 王汎森、潘光哲、吳政上主編，《傅斯年遺札》，第3卷，頁1684-1685。

其中第五分班的問題，關係到北大和清華的立場，傅斯年、陳雪屏、鄭天挺三人商議過後，由傅斯年告知朱家驊解決辦法：

當時在尊寓（按：朱家驊住處）談及此等問題時，本說明名稱上係北大清華合辦，但由清華主持，其意在北大目前無力再增辦一學院，而清華有辦工學院之經驗，並有教員可以兼課。此意曾經沈蕤齋（按：沈履）王明之兩兄接受，弟並提出將清華放在前頭，亦所以表示清華為主之意。此事經過，雪屏兄曾有紀錄送綸閣（按：周鴻經）兄，絕無北大主辦之說。如尊電所云者，北大目下已經擴張太大，成一不了之局。後來綸閣兄對弟言，此一合辦工學院之經費放在北大，因清華既有工學院，若又設立一工學院，恐怕預算上有問題。弟當即言其不可，綸閣兄謂之不過預算之編列，並無改於原來之辦法。現在有一妙計，即將此工學院併入北洋大學是也。現在北洋大學東西一無所有，李書田又擅自將大部所不承認之學生帶來（即在陝西之學生，大部所不承認者，及英士大學之學生，共三百餘人），此間北洋大學辦事者張□滋徐澤昆兩君正以為憂，弟以此說密告之，兩君大喜，蓋一則以為學生來源不同，或易辦理；二則以為可稍得設備。此法如可實現，一切難題可以解決。切盼吾兄立即與唐經兄一商，並早有決定，電示後再行宣布，事前保持絕對秘密。張徐二君意，假如今年不能在天津上課，似可就北平原址在本年內上課。此亦是一法，並聞。北大希望將來房子撥交北大，因其離醫學院□近也。¹²⁰

以上顯示第五分班對北大和清華是燙手山芋，雙方都不願意獨自承接。傅斯年認為北大的擴張超出其能力範圍，反映戰後教育資源重新分配的過程，北大得到的挹注，令其他學校難以望其項背。有關擴建院系的優先順序，農學院和醫學院比工學院更受重視。接收補習班分班作為增設新學院的基礎，北大不願接受過多補習班學生，工學院不在優先發展之列，如今北洋大學願意接手，自然一拍即合。至於戰後各大學復員多面臨「房荒」的問題，北大得力於朱家驊的黨政關係而順利解決。

¹²⁰ 「傅斯年」，〈人才人事〉，《朱家驊檔案》，館藏號：301-01-23-784。當晚三人會商的情形，另可參見鄭天挺著，俞國林點校，《鄭天挺西南聯大日記》，下冊，1946年6月4日，頁1182-1183。

北大籌劃新學院之際，不希望因接收補習班影響學校的體制。醫學院將預算、人事和行政分開處理，反映預算和人事不在其掌控範圍內。傅斯年向胡適說明為醫學院編列7億元預算，卻仍感不足，沒有把握可以如數取得。¹²¹ 人事上過去北大少與醫學界聯繫，院長人選徵詢過吳憲和善後救濟總署衛生委員會主任委員劉瑞恆（1891-1961）未果，最終由補習班第六分班主任馬文昭（1886-1965）出任。因師資人力不足，對補習班醫學院和農學院分班的教員儘可能留用。根據1945年的調查資料，「偽北大」時期醫學院有28名中國籍教授，復員後留下11位。¹²² 這也顯示出傅斯年嚴守忠奸之辨之餘，有其務實的一面。

院系規劃漸具雛形，最重要的關鍵仍是經費能否到位。1946年5月31日，傅斯年致信朱家驊，說明北大復員經費共需26億元，現下已領到14億元，尚不足12億元：

以上相差十二億，大體皆因醫農兩院之故，醫學院弟前陳明須七億，目下看來，有少無多。農學院舊址破壞情形殊出弟意料之外，實為廢墟。我們一面修理，軍隊一面打毀，真不成事體。目下房子尚有許多大難題，正在奮鬥中。復員經費必須增加，北大學院人數及農醫兩院，及一年級校舍情形，當不如清華，故其增加復員經費，實有充分理由。以上所談增十二億之數，萬不得已亦乞增十一億。看來是費錢，實則弟要到房子不少，非如此不能全部解決，凡一事不能全部解決，則前所用者皆浪費也。萬乞吾兄體念北大北遷之艱難，使弟將五學院恢復之事，一氣呵成，至為感激，如此北大上軌道，實教育界一大事也，可抒政府此後之憂矣。¹²³

以上內容反映北大籌設醫農兩學院，無法離開教育部支持。傅斯年將清華作為比

¹²¹ 歐陽哲生主編，《傅斯年全集》，第7卷，頁304-305。

¹²² 參見「北京大學醫學院資料調查」，〈教育部長〉，《朱家驊檔案》，館藏號：301-01-09-088；「國立北京大學在校教員名冊（截至三十五年十二月底）」，收入北京大學校史研究室編，《北京大學史料（1946-1948）》，第4卷，頁174-177。這些留下的「偽北大」醫學院教授，多具有協和醫學院的背景，日後胡適即借鑒「協和模式」發展北大醫學院。參見張蒙，〈導入美國醫學：抗戰勝利後北京大學對偽北大醫學院的接收與改造〉，《抗日戰爭研究》，2021年第1期（2021年3月），頁126-138。

¹²³ 「傅斯年」，〈人才人事〉，《朱家驊檔案》，館藏號：301-01-23-784。

較的對象，即具有競爭含意。傅斯年強調此時不能得到增列預算，之前的努力就會白費，信末欲將五個學院的安排一次到位，可知此時工學院仍未有明確規劃。

上述傅斯年主導、朱家驊在能力範圍內盡力給予協助，對北大產生的實質影響，可以比較1947年度北大和清華的經常費預算（參見表2），了解兩校復員後的規模差距。北大擁有文、理、法、醫、農、工六個學院，共有學生約5,000人，教職員約1,300人。年度概算書中提到「本校之醫學院為華北唯一之國立醫學院，並設有應診之病院，病床概多，範圍甚大，人員經費與一般不設應診醫院之醫學院大不相同。又本校之農學院亦為華北唯一之國立農學院，有農場林場五處，肩負研究若干北方農業問題之任務」。¹²⁴ 這份概算書反映北大醫學院和農學院在華北的領先地位，相較之下，清華沒有醫學院，農學院在力爭後雖取得教育部同意，但規模極小。¹²⁵ 就教職員人數而言，北大（1,314人）是清華（640人）

表2、1947年度北大、清華經常費預算分配比較

支用類別	北大	清華
俸給費	6,882,480元	3,188,760元
辦公費	3,441,240,000元	518,664,000元
購置費	688,248,000元	103,734,000元
學術研究費	1,548,000,000元	207,465,120元
特別費	121,920,000元	201,278,120元
總計	5,806,290,480元*	1,037,330,000元**

資料說明：*原列數字為5,806,270,480元，經計算更正為5,806,290,480元。

**上列各項經費合計1,034,330,000元，該年度清華附設成志初級中學，奉教育部准予備案，經費暫不由清華籌撥，每年酌予補助3,000,000元，不另附預算分配表，因此合計預算為1,037,330,000元。

資料來源：「國立北京大學三十六年度經常費支出概算書」，北京大學校史研究室編，《北京大學史料（1946-1948）》，第4卷，頁750；「國立清華大學1947年度經常費預算分配表」，清華大學校史研究室編，《清華大學史料選編》，第4卷（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1991年），頁543。

的兩倍，接近兩校在俸給費上的差距。至於其他項目除特別費以外，北大皆遠超過清華。以辦公費為例，北大較清華多出近6.5倍，概算書中提到「本校校舍散

¹²⁴ 北京大學校史研究室編，《北京大學史料（1946-1948）》，第4卷，頁750。

¹²⁵ 清華大學校史編寫組，《清華大學校史稿》，頁433-436。

漫，六學院分在六處，另有一年級及醫院、宿舍、農場等，合十五單位」，¹²⁶ 其中不乏傅斯年爭取的成果。教育部審議該年度各大學經常費時，沈履暗示梅貽琦，北大因為朱家驊的關係得到較多預算，推測為避免他人言語，調降北大復員的修建費。¹²⁷ 然而，因傅斯年不斷向朱家驊曉以利害，教育部遂於1946年7月追加北大的修建費。¹²⁸

實際上，復員經費包含擴增院系在內，屬於臨時性支出，一定程度反映主事者爭取預算展現的行政協調能力。傅斯年抵達北平以後，自認大部分心力都放在籌備醫學院，處理補習班也是為了復員工作順利推展。從聘用教授和爭取經費兩事，可以看出傅斯年的辦事能力，也說明蔣介石要他擔任北大校長，實有識人眼光。傅斯年為了復員一事心力交瘁，卻仍心繫學術，希望儘快回到史語所，因此不滿胡適遲不回國。在給史語所同事董作賓（1895-1963）的信中，認為自己4月可以卸下代理校長，並且聲明絕對不做官，也不會離開史語所，改入北大：「目下只是為人拉夫，而定明是短期也。適之先生下月可歸，所以我對北大的責任四月也就結束了。」¹²⁹ 後續發展顯然超出傅斯年的預期。其實傅斯年的工作並不僅止於替北大物色人才，說明其對外界談話有所保留。5月，朱家驊和王世杰聽聞胡適心臟病復發，致電告以北大有傅斯年主持，延至秋天返國並無不便。傅斯年得知後，不無調侃地提到「弟之性命亦非一文不值者也」。¹³⁰

1946年6月，胡適自紐約啟程，返國後參與北大復員最後階段的工作。8月16日，胡適親自主持北大第1次行政會議，該會是校務會議成立前的最高決議機關，負責編列預算、擬定院系設立和廢止等重要事項。¹³¹ 相較於醫學院和農學院所爭取的經費，連同補習班留下的師資、設備和土地，工學院在幾乎沒有基礎的

¹²⁶ 北京大學校史研究室編，《北京大學史料（1946-1948）》，第4卷，頁750。

¹²⁷ 清華大學校史研究室編，《清華大學史料選編》，第3卷上（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1991年），頁416-418。此前教育部在1946年4月10日核定聯大三校的復員經費，其中修建費共30億元，北大分得10億元，清華分得12億元，南開分得8億元。

¹²⁸ 北京大學校史研究室編，《北京大學史料（1946-1948）》，第4卷，頁720。

¹²⁹ 王汎森、潘光哲、吳政上主編，《傅斯年遺札》，第3卷，頁1670-1671。

¹³⁰ 胡適著，曹伯言整理，《胡適日記全集》，第8冊（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04年），1946年5月17日，頁233；「傅斯年」，〈人才人事〉，《朱家驊檔案》，館藏號：301-01-23-784。

¹³¹ 北京大學校史研究室編，《北京大學史料（1946-1948）》，第4卷，頁10。

情況下，經第3次行政會議決議設立，由傅斯年擔任籌備委員會召集人。第4次行政會議通過本年度先設立機械和電機兩系，學制五年。第6次行政會議決議明年添設土木、化工、礦冶三系，後年添設航空、建築兩系。第15次行政會議擬定預算分配，新增的農學院和醫學院並列第一，工學院和理學院並列第三。¹³² 就籌備過程來看，工學院起步最晚，後續擴充科系也不順利。1947年2月，朱家驊回覆北大調整學系的請求，認為先前北大因不願接收補習班工學院分班，乃併入北洋大學，目前既已設立機械、電機兩系，應求充實兩系，不必再設立新系。¹³³ 同年8月，教育部決議將北洋大學北平分部撥交北大，但該校工學院教授多不願接受北大聘書，致使北大只能聘請更多的兼任講師，最重要的師資問題依舊未能解決。¹³⁴

總結復員期間的成果，1946年10月10日，北大舉行開學典禮，胡適回顧北大的歷史，復員工作使學生人數大幅增加，新增三個學院造就目前的大格局，意味著北大對國家和社會的責任更加重大。提到新設立的醫學院，胡適自豪地認為不論人才和設備都是國內頂尖。¹³⁵ 然而北大開學並不意味著復員工作就此結束，仍有許多問題尚待解決。10月26日，胡適致電朱家驊，提到北大員生眾多，以致每月所需費用甚巨，請教育部預先發放預算，朱家驊回覆當盡力援助北大。11月9日，朱家驊告以復員工作追加經費，北大分得5億元。¹³⁶ 對胡適而言，實際接觸行政事務以後，更能體會傅斯年在復員期間的貢獻。

北大在復員前後不斷敦請教育部追加經費，除通貨膨脹外，也反映國民政府教育經費長期不足的問題。傅斯年曾經向朱家驊駁斥外界呼之為「北大派」，內容值得深思：

¹³² 北京大學校史研究室編，《北京大學史料（1946-1948）》，第4卷，頁11-15、23-26、44。

¹³³ 北京大學校史研究室編，《北京大學史料（1946-1948）》，第4卷，頁600-601。

¹³⁴ 北京大學校史研究室編，《北京大學史料（1946-1948）》，第4卷，頁648-649。

¹³⁵ 潘光哲主編，《胡適全集：胡適時論集》，第6冊（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18年），頁36-37。

¹³⁶ 潘光哲主編，《胡適全集：胡適中文書信集》，第3冊，頁538；耿雲志主編，《胡適遺稿及秘藏書信》，第25冊，頁453-455；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中華民國史研究室編，《胡適來往書信選》，下冊，頁142。

此信與兄談北京大學事，弟一談此，兄或許就發笑，故不可不有一序文。弟被人呼為「北大派」久矣。此詞有兩種含義，一為聚同學而到處佔地盤，此行為乃弟所深鄙，弟一向對朋友檢點最嚴，兄也認為是一毛病矣。過猶不及，只有同學打架，未有同學聚黨者也。故此義之北大派，絕對非是。又一為欲北大之成為第一流大學，為此便為北大派，則弟當為百分之百的北大派。此公義也，受之不覺其非，亦願人人稱善。¹³⁷

復員過程使傅斯年體認到教育經費不足，短期內難以改善，為建立北大成為世界第一流大學的目標，勢必將排擠其他學校的資源，但他別無選擇。

回顧1944年至1946年教育經費占中央總預算的比例，分別為3.37%、1.67%、5.14%，朱家驊向陳布雷提到辦理教育時深感財力不足。¹³⁸ 1946年12月，國民大會制訂憲法，第164條規定「教育、科學、文化之經費，在中央不得少於其預算總額百分之十五」，朱家驊據此在國民參政會報告，指出各級教育經費不足，只能持續追加預算。¹³⁹ 在協助各大學復員的過程中，朱家驊即便對北大有私心，但巧婦也難為無米之炊。只有當教育資源足夠時，學校之間的競爭才可能發揮正向的積極作用。但是20世紀上半葉中國長期戰亂，使大學欠缺穩定發展的條件。北大開學典禮後不久，國軍收復張家口，蔣介石在日記中提到：「本週實為國家至危、戰事至急，亦為轉危為安，轉敗為勝之一週也。」¹⁴⁰ 此時蔣介石相當有自信，認為在短期內即可解決戰事。無論是政治界或學術界，對於內戰不可避免或有心理準備，卻沒能料到國民政府會快速從優勢轉為劣勢，最終失去大陸。戰後北大復員處於抗戰結束至國共內戰爆發前的過渡期間，無法擺脫戰爭的陰影。

¹³⁷ 「傅斯年」，〈人才人事〉，《朱家驊檔案》，館藏號：301-01-23-784。

¹³⁸ 《第二次中國教育年鑑》，收入張研、孫燕京主編，《民國史料叢刊：文教·教育概況》，第978冊（鄭州：大象出版社，2009年），頁24；陳布雷著，陳新林、呂芳上總編輯，《陳布雷從政日記（1946）》（香港：開源書局；臺北：民國歷史文化學社，2019年），1946年9月9日，頁139。

¹³⁹ 「教育施政報告」，〈教育部長〉，《朱家驊檔案》，館藏號：301-01-09-005。

¹⁴⁰ 「自記本星期反省錄」（1946年4月12日），〈事略稿本—民國三十五年十月〉，《蔣中正總統文物》，典藏號：002-060100-00217-012。

伍、代結論：北大復員過程中的得與失

本文以近代人物不同背景的人際關係網絡，勾勒北大復員過程的曲折。其中最重要的關鍵是朱家驊與傅斯年的合作。朱家驊在學術事業上充分支持傅斯年，雖然傅斯年個性較急，朱家驊身邊亦有不滿傅斯年的聲音，但兩人始終合作無間。¹⁴¹ 北大復員是兩人繼廣州中山大學與中研院之後，又一次合作振興學術事業。與前兩次相比，重整北大的困難在於牽涉戰後復員政策下的資源分配。戰前北大的學術地位，不能保證在戰後能順利重建，更加凸顯朱家驊以學人從政身分，建立黨政關係的重要性。過去有關北大復員的研究，未曾注意此點。同時戰時朱家驊即肩負發展學校黨務的任務，引薦許多學人入黨，並延續至戰後。要如何看待朱家驊在支持教育事業與結合政治力量下學人從政的雙重角色？以「大學自主」的觀點而言，朱家驊被賦予的角色值得商榷；然而回歸歷史的脈絡，卻很難以單一的價值取向來評價。

總結朱家驊一生的經歷，可以用「掌握權力，惠澤學界」形容。1944年重掌教育部，在任內無法推動大幅度改革，有客觀因素的限制，包括黨內的派系鬥爭和教育經費不足。他在北大和清華的競爭中，因過去與北大的淵源而有所偏袒，卻不能否認復員時期其對學術復興的貢獻。然而，朱家驊長期投入政治，不可避免地受到黨政運作思考模式的影響。朱家驊檔案中留有大量與學界人物的來往書信，裡面有相當的比例是舉薦人才。此一現象不失為當時通行的引進人才方式，使被推薦者在適當位置發揮所長，卻難免被貼上朱家驊派系的標籤。透過朱家驊的經歷，可以進一步思索學人從政的兩難，不僅在於追求政治抑或學術成就之間的抉擇，還有既參與政治，又必須適度與政治保持距離的不易。

朱家驊運用政治權力支持北大復員，提供研究學人從政的不同視角，但是這種依附在個人影響力之下的發展難以維持。長遠來看，學校的發展必須配合國家的政策方向，穩定提供國家建設所需人才，才能持續受惠於人際網絡帶來的正面效益。北大學人打造世界一流大學的理想，從朱家驊出任教育部長到胡適接任北大校長，並由傅斯年主持復員工作，都如北大學人的預料順利發展。朱家驊請北

¹⁴¹ 大陸雜誌社編委會編，《朱家驊先生紀念冊》，頁324-325、370。

大預先籌劃新學院，並在復員期間給予人事、行政和經費的協助，加上傅斯年傑出的行政能力，擴增學院得以實現，並取得許多房產和土地。當然復員工作也有一些挫折，包括被迫接收過多的補習班學生，加深財政壓力。同時原先規劃與清華合辦補習班工學院分班，因北大沒有承接該分班的基礎，並能趁機削減素質不純的補習班學生，最終在兩校各有盤算之下破局，由北洋大學接手。此項決策使得新設的工學院缺乏師資和設備，規模不如預期，是復員工作中的最大敗筆。

就各大學競爭教育資源的視角，北大與清華作為中國的頂尖大學，呈現既合作又競爭的面向，本文探討的復員時期，國民政府面對戰後國內外局勢，更加銳意高等教育需配合國家政策，在此一前提下，本應將各大學的學術傳統納入考量。北大自蔡元培（1868-1940）時期便注重發展文、理學院等基礎學科；清華則從梅貽琦擔任校長後，發展出國內首屈一指的工學院。儘管如此，北大優越的政學網絡，在資源分配時發揮重要的影響力，且與清華部分教授攻訐國民政府的言行，形成鮮明對比，使北大在與清華的競爭中占據有利地位。復員後北大坐擁文、理、法、醫、農、工六個學院，其中影響國家未來發展最重要的是工業政策，與之相對應的工學院，本應重點經營，卻只投入有限的資源。兩校的競爭隨著復員告一段落，但並不代表競爭就此結束。

徵引書目

一、檔案

《朱家驊檔案》（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檔案館藏）

〈人才人事〉。

〈中研院總幹事、院長〉。

〈教育部長〉。

《國民政府》（臺北，國史館藏）

〈工業建設（八）〉。

《蔣中正總統文物》（臺北，國史館藏）

〈一般資料—手令登錄（三十一）〉。

〈一般資料—手令登錄（三十四）〉。

〈事略稿本—民國三十三年十二月〉。

〈事略稿本—民國三十五年一月〉。

〈事略稿本—民國三十五年六月〉。

〈事略稿本—民國三十五年十月〉。

〈革命文獻—政治：政經重要設施（一）〉。

〈領袖照片資料輯集（五）〉。

《蔣介石日記》（Palo Alto, California, Hoover Institution, Stanford University）

二、史料彙編

北京大學校史研究室編，《北京大學史料（1937-1945）》、《北京大學史料（1946-1948）》，第3、4卷。北京：北京大學，1993年。

北京大學等編，《國立西南聯合大學史料》，第2、3冊。昆明：雲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

清華大學校史研究室編，《清華大學史料選編》，第3卷上、第4卷。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1991年。

張研、孫燕京主編，《民國史料叢刊：文教·教育概況》，第978冊。鄭州：大象出版社，2009年。

三、年鑑、工具書

王學珍主編，《北京大學紀事（1898-1997）》。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年。

徐友春主編，《民國人物大辭典》。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1991年。

張朋園、沈懷玉合編，《國民政府職官年表（1925-1949）》。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7年。

劉維開編輯，《中國國民黨職名錄》。臺北：中國國民黨黨史會，1994年。

四、文集、日記、書信集、年譜、回憶錄

大陸雜誌社編委會編，《朱家驊先生紀念冊》。臺北：文海出版社，1986年。

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中華民國史研究室編，《胡適來往書信選》，中、下冊。香港：中華書局，1983年。

王汎森、潘光哲、吳政上主編，《傅斯年遺札》，第2、3卷。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2011年。

王世杰著，林美莉編輯校訂，《王世杰日記》，上冊。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12年。

吳廷璩編，《鄭天挺紀念文集》。北京：中華書局，1990年。

胡頌平，《朱家驊年譜》。臺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69年。

胡適著，曹伯言整理，《胡適日記全集》，第8冊。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04年。

耿雲志主編，《胡適遺稿及秘藏書信》，第25冊。合肥：黃山書社，1994年。

梅貽琦著，黃延復、王小寧整理，《梅貽琦西南聯大日記》。北京：中華書局，2018年。

陳布雷著，陳新林、呂芳上總編輯，《陳布雷從政日記（1944）》、《陳布雷從政日記（1946）》。香港：開源書局；臺北：民國歷史文化學社，2019年。

楊聯陞著，蔣力編，《哈佛遺墨》。北京：商務印書館，2013年修訂本。

鄭天挺著，俞國林點校，《鄭天挺西南聯大日記》，上、下冊。北京：中華書局，2018年。

歐陽哲生主編，《傅斯年全集》，第1、7卷。長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0年。

潘光哲主編，《胡適全集：胡適中文書信集》，第3、6冊。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18年。

五、雜誌、報紙

- 《大公報》，重慶，1945年
《教育部公報》，南京，1945年。
《教育通訊》，漢口，1946年。

六、專書

- 王東杰，《國家與學術的地方互動：四川大學國立化進程（1925-1939）》。北京：三聯書店，2005年。
西南聯合大學北京校友會編，《國立西南聯合大學校史》。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年修訂版。
江勇振，《蔣廷黻：從史學家到聯合國席次保衛戰的外交官》。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21年。
林桶法，《從接收到淪陷：戰後平津地區接收工作之檢討》。臺北：東大圖書公司，1997年。
易社強（John Israel）著、饒佳榮譯，《戰爭與革命中的西南聯大》。臺北：傳記文學出版社，2010年。
許小青，《政局與學府：從東南大學到中央大學（1919-1937）》。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9年。
張瑞德，《無聲的要角：蔣介石的侍從室與戰時中國》。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2017年。
賀金林，《抗戰勝利後國民政府教育復員研究》。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0年。
黃克武，《顧孟餘的清高：中國近代史的另一種可能》。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20年。
黃麗安，《朱家驊學術理想及其實踐》。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8年。
清華大學校史編寫組，《清華大學校史稿》。北京：中華書局，1981年。
鄭友揆等著，《舊中國的資源委員會（1932-1949）——史實與評價》。上海：上海社會科學出版社，1991年。
蔣寶麟，《民國時期中央大學的學術與政治：1927-1949》。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16年。
蕭超然編著，《北京大學校史（1898-1949）》。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88

年增訂本。

Cong, Xiao-ping, *Teachers' Schools and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Chinese Nation-State, 1897-1937*. Vancouver: UBC Press, 2007.

Fairbank, John and Albert Feuerwerker eds.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Volume 13: Republican China, 1912-1949, Part 2*.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6.

Yeh, Wen-Hsin. *The Alienated Academy: Culture and Politics in Republican China, 1919-1937*.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1990.

七、期刊論文、專書論文、學位論文

王奇生，〈戰時大學校園中的國民黨：以西南聯大為中心〉，《歷史研究》，2006年第4期（2006年8月）。

何方昱，〈民國時期從政學人的學術與事功——兼評《朱家驊學術理想及其實踐》〉，《史林》，2018年第5期（2018年10月）。

金以林，〈蔣介石的1932年〉，收入汪朝光主編，《蔣介石的人際網絡》。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1年。

陳永發，〈關鍵的一年——蔣中正與豫湘桂大潰敗〉，收入劉翠溶主編，《中國歷史的再思考》。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15年。

張蒙，〈導入美國醫學：抗戰勝利後北京大學對偽北大醫學院的接收與改造〉，《抗日戰爭研究》，2021年第1期（2021年3月）。

賀金林，〈偽北京大學教授群體的來源與後方學界的回應〉，《北京社會科學》，2017年第8期（2017年8月）。

鄭會欣，〈蔣介石與民國學人關係的嬗變（1932-1949）〉，《二十一世紀》，總第177期（2020年2月）。

羅久蓉，〈抗戰勝利後教育甄審的理論與實際〉，《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22期（上）（1993年6月）。

嚴海建，〈抗戰時期西南聯大內部校際分合的界限與爭論〉，《高等教育研究》，第41卷第3期（2020年3月）。

嚴海建，〈蔣夢麟與全面抗戰時期北京大學的變局〉，《中山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2年第3期（2022年6月）。

八、網路資料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數位資料庫：<http://mhdb.mh.sinica.edu.tw/>（2020/8/26
點閱）。